

1997-2007 淡水湾花园 东方天地
热烈祝贺香港回归 10 周年

4号楼即将登场
新天地马当路 588 号

淡水湾花园 东方天地
发展商：上海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21-53866606 53820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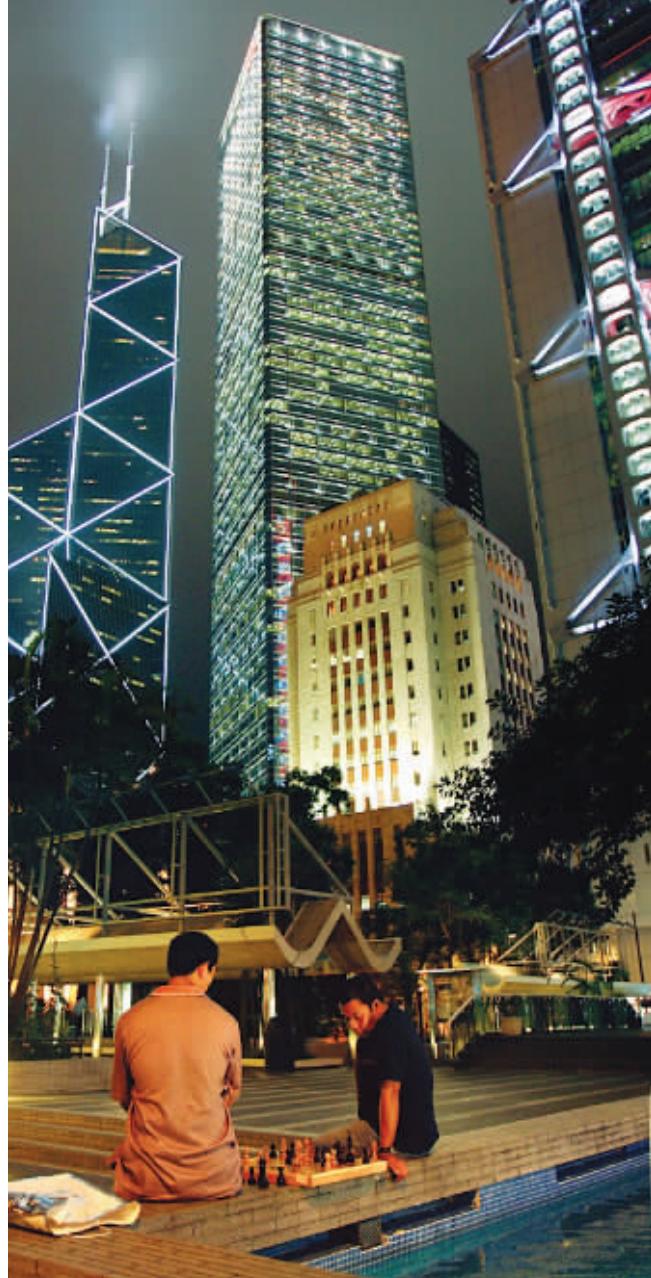
星光灿烂在香江

这些年，常去香港，多半是为了采访明星。明星在香港的影响力，明星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建构意义，是超乎我的想象的。第一次去位于太平山顶凌霄阁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参观，发现明星远远多过其他业界的名人，而且也最受欢迎，这颇让我惊讶。我不无揶揄地对香港同行说，这里可是明星无处不在啊。我又问道，明星们真的能在社会上得到承认，而不是表面风光吗？他们告诉我，明星在香港不只是偶像，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形象、楷模和精神象征，而这是主流意识。

于是，当我再去采访作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刘德华、郭富城、杨千嬅等明星时，我不再惊讶了。

那天，在香港艺术馆，刘德华接受我的采访，我第一句话便是对他说，能在这里而不是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或是舞台的帷幕后面做这样的采访，我非常愉快。刘德华也笑着说，我同样喜欢在这样的地方进行交流。香港艺术馆致力于保存中国文化精髓和推广香港艺术，其公之于世的“使命”之一，是要使参观艺术馆成为每个市民一种兼备教育、美感、思考和文化内容的经验。在书画展厅，刘德华和我聊起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见解，而在我亲眼目睹他的一手棒极了的毛笔字时，我体会到了香港社会通过明星提升市民对艺术的欣赏能力，拓宽文化视野，激活创意的用心。后来，每每听到刘德华演唱《我是中国人》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涌过他挥毫走笔的意识流，我想，他是代表着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光大的。

去采访杨千嬅的时候，她刚刚获得当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与她同获殊荣的还有许志安和古巨基。十位获奖者中明星一举占去三席，这在该奖项评选历史上是空前的。三位明星之所以能够获奖，除了演艺方面的成就，更是因为他们都热心公益事业。杨千嬅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形象大使，参加了为南亚海啸灾民筹款和探访山西艾滋病儿童等公益活动；来自草根家庭的许志安担任“更生大使”和“平等机会大使”，呼吁社会接纳改过自新人士并关怀弱势群体；古巨基则担任“光明大使”等职，建立了儿童医疗基金，为海内外病患儿童筹募医疗费用。那天，我问杨千嬅，你是不是捐了很多的钱，她回答我说，钱不是一个指标，身体力行去为社会作贡献才是最要紧的。不久，我又去采访古巨基，这位阳光男孩带着腼腆的笑容，在我的采访本上随手画了一只小猫，让我觉得他是如此富有爱心。明星对社会，尤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力不可低估，那么，何不借助明星的榜样力量，引导人们奋发向上，服务社会呢？



繁华的背后

张卓君

去了好多次香港，渐渐对香港变得熟悉起来。去年，我开始做自己的事业，几乎每个月要跑一次香港。对香港的接触越多，我对它的喜爱也越深，自然感悟也变得不同起来。

初次在香港购物，遇到的服务员会普通话的很少。英语不好的我，只能用日语沟通。而现在，在香港用普通话购物已经很通畅。初次去香港，更多感受到的是它的繁华，它的物足，它独特的城市面貌。可是现在，我更被香港这座城市的精神所折服。5月我在香港，去之前为了通话方便，特意开通了全球通一卡多号香港业务。但是我到香港后，才发现我的手机变成了哑巴，无法正常使用漫游业务了。当时，我在时代广场购物，想给家人打电话时才发现这个情况。情急之下，我找到化妆品 LAMER 柜台的陈小姐，希望她能帮我试打一下我的电话号码。手上还做着生意的陈小姐微笑着答应了我。不一会儿，就开始帮我反复拨打电话起来，还特意帮我打去电讯公司询问。虽然没能解决问题，但是她的热心和微笑让我心底的不快挥去很多。我第一次在 LAMER 买东西时，认识了这位香港女孩。当时我还想多买东西，她却建议我先用几款产品试



做了香港的媳妇

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香港的繁华震撼了我。

进入新世纪不久，我成了香港人的媳妇。“自由行”实施起，香港行成了无障碍通道。随着对香港的感受越来越真切，爱也与日俱增。

先生家是个大家庭。每逢中国新年，散居美英加澳等地的兄姐都会设法回港团圆。在香港过年也成了我每年最开心的节目。我一般会在除夕前三四天到港，因为那是香港商家打折售卖的高潮。两日的购物效率和满意度，高过大半年。

除夕夜的团年饭和初三的开年饭都由大嫂早早在马会预定好。

东丽 因为我们做大学校长的大哥是香港赛马会的资深会员。先生家七兄妹加上大嫂家六姐弟，四代同堂共同的家长是我们的姻伯父母——已过钻石婚庆的 90 高寿的范家两老。

席开三桌。无论是精美的水晶杯还是包金的筷匙架，会所的每样物件都烙有马会标记。至各家到齐，相互贺年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派受新年“利是”。原则是：长辈派，小辈收；平辈之间已婚者派，单身者收。我和先生因为行末，便总是收的多，派的少。我便想出了送长者实物“利是”的办法。去年我们送两老的是寿山石雕“寿星”和“鲤鱼”，恭祝老人健康长寿，连年有余。这样巧妙的“利是”，老人当然爱不释手。席间大哥喜欢领着小辈们在会所各处参观，因为平时非会员不得入内，还买各式各样的马会标记的礼物送给我们。会所给我的最深印象不是奢华，而是低调的高贵，那是真正的高贵。不用说正厅，就是最僻静角落的扶梯，都有真皮包裹的高及成人胸口的护墙及厚实松软的满铺地毯。哪怕再顽皮的小童不慎由高处滚下，都能确保安然无恙。大人们冗长的应酬谈话孩童会甚觉无趣，会所为他们设下整整一层游戏房，不仅侄儿侄女们，连我这年届不惑的大人，依然每次都被她足够的魅力迷惑久久。

席间兄嫂们对我这位上海小媳妇总是关爱有加。被美国一世界 500 强公司派驻上海任高管的四哥在上海也安了一个家，加上我和来自台北的四嫂同龄又投缘，两家过从更亲密些。此时四哥会把他的宝贝——高配置的 NIKON 长焦镜借给我，去花园里拍对面马场的夜景。范家大哥虽贵为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却吹拉弹唱样样来得。难得的是他不但能说上海话，还能唱沪语老歌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

爱香港的理由还有好多：环境优美洁净、长幼斯文有礼、交通便捷畅达、医疗教育水准世界一流……作为上海的女儿和香港的媳妇，我真诚地企望：娘家和婆家，一样好！

情牵沪港二十八年

20世纪 70 年代末，我穿着中山装拎着帆布包，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抵达深圳。当进入罗湖海关时，港英海关警员以鄙视、冷漠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用夹着港式英语的广东话对我提问。双方比划了很久，还是搞不清什么意思。因为我听不懂广东话，而警员听不懂普通话，更不说上海话了。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出门不敢问路，更不敢上街购物。呆了好几个月，找到一份跟车送货的差事。我口袋里揣着向人达意的小纸本和笔，有时也硬着头皮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与港人交流，可仍如鸡鸣对话。那时，一些邻居和同事称呼我为“大陆仔”、“大乡里”（乡下佬）。后来，内地改革开放日盛，因我会讲上海话，被公司老板派往上海拓展商贸。

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港人来沪经商、旅游。一下子，我这个“大陆仔”吃香了起来。每次回港，总有一大帮人主动约我，要我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我还成了同事们公认的普通话老师。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上海的亲朋好友也迫不及待地来到香港，参观游览金紫荆广场、海洋公园、浅水湾、铜锣湾……这时，我成了他们的导游兼翻译。沪港两地有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进取好学。如今，上海开设了不少粤语学习班，香港也一样，普通话进修学校（培训机构）如同雨后春笋遍布港九。金领、白领、蓝领等各阶层人士踊跃参加国语、沪语的培训。普通话成了香港大、中小学生必修课，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则写明：“某某职位，往内地工作，能讲流利的普通话，懂上海话者优先。”

一次，我在上海的淮海路上购物，突然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侬好呀！James，阿拉是上海人了！”我回头一看，以前叫我“大陆仔”的老同事 Eric 竟在我身旁。“咦？侬哪能会讲上海闲话咯？”他指指身边一位抱小孩的少妇：“是伊教我咯。”我笑道：“噢！怪不得侬个‘阿香’拖到四十几岁才结婚，目的是想讨个上海老婆。”“嘻嘻……”Eric 笑得很得意。临别时，他还邀我去他在莘庄购置的新房白相。

斗转星移，光阴如梭。我二十八年往返于沪港两地的经历，印证了沪港情谊，沪港两地就如祖国母亲生的一对兄弟，难舍难分。

